

《大乘经庄严论》烈维本中所缺的三首偈颂
Three Verses of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Missing in Sylvain Lévi's Edition

叶少勇

YE Shaoyong

北京大学南亚学系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摘要：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于 1907 年校勘出版的《大乘经庄严论》（*Mahāyānasūtrāṃkāra*）梵本，是这一瑜伽行派重要文献的研究底本。烈维所依据的写本中有一叶缺失，导致其刊本缺少第 2 品第 4—11 颂。西藏贝叶经中新发现了一部《经庄严论修习疏》（*Sūtrāṃkāraparicaya*）梵文残本，据其所引颂文可以补上烈维本所缺的第 9 至 11 颂。

关键词：《大乘经庄严论》、《经庄严论修习疏》、梵文写本

ABSTRACT: The edito princeps of the *Mahāyānasūtrāṃkāra* edited by Sylvain Lévi in 1907 has a sizable lacuna, Chapter 2, verses 4-11, due to a single missing folio in the manuscript he used. An incomplet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Sūtrāṃkāraparicaya* was recently found in Tibet, on the basis of whose citations verses 9-11 can be successfully restored.

KEYWORDS: *Mahāyānasūtrāṃkāra*, *Sūtrāṃkāraparicaya*, Sanskrit manuscripts

《大乘经庄严论》(*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是大乘瑜伽行派的根本论典之一,存汉译(波罗颇蜜多罗译,题作《大乘庄严经论》,T 1604)和藏译(D 4026)。关于其作者,各种文献的记载很不一致。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其本颂(*kārikā*,后简称《庄严颂》)为弥勒所作,注释(*bhāṣya*,后简称《庄严释》)为世亲所作。上世纪初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首次发现其梵文写本,并于1907年校订刊行。烈维所依据的梵文写本抄写于1677或1678年,其第2品中有一叶缺失,一叶《辩法法性论》混而代之,导致烈维刊本的第4颂至第11颂及其注释缺失。

其后至今,在尼泊尔又新发现了8部《庄严释》和一部《庄严颂》梵文写本。遗憾的是,除这部《庄严颂》梵本外,其他写本多是20世纪初的现代抄本,而且都是抄自烈维所据的梵本。而这部《庄严颂》梵本的谱系虽然更早一些,可以用来修订烈维本的一些缺误,却同样跳过了第2品中的那8首偈颂。可见所有这些写本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在其中就已经缺失了这一叶^①。罗睺罗(*Rāhula Sāṅkṛtyāyana*)摄于俄尔寺的贝叶照片中也存有8片《庄严释》梵本残叶,最早由日本高野山大学加纳和雄博士比定(Kano 2005),并于近期发表了其中一叶的校勘(Kano 2012)。根据这篇文章的判断,此写本是12或13世纪的尼泊尔写本,可惜其残叶只包含第10、11、14、15、16、17、18品,同样无法弥补烈维本中的空缺。

笔者近年来一直在整理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收藏的原民族宫藏梵文写本的缩微胶片^②。2012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5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上,笔者公布了一批从第15—17函中新比定出的梵文写本,其中有一批以夏拉达字体(*Śāradā*)书写的贝叶,包含一部题作《经庄严论修学疏》(*Sūtrālamkāraparicaya*,后简称《修学疏》)的梵文残本。

这是一部逐颂引用并解释《庄严颂》的梵文著作,目前还不知道其作者,也没有找到任何与它相关的译本或文献记载。该写本上删改的痕迹较多,所标叶码也有错乱,有可能是作者本人的手稿。另值得一提的是,该写本的章品编号与烈维所依据的尼泊尔写本不同,而与汉译、藏译一致。尼泊尔本中的第一品,在这里被分为两品。

在这批字体和形制都相仿的贝叶之中,另有两部阐述《庄严颂》大意的著作,一为萨遮那(*Sajjana*)所作的《经庄严论总义》(*Sūtrāṅkārapañḍārtha*),一为摩诃遮那(*Mahājana*)所作的《经庄严论品题集》(*Sūtrālamkāradhikārasaṃgatī*),这两个人是父子关系,来自一个活跃于11世纪后半至12世纪前半的克什米尔班智达家族^③。西藏地区弥勒论著的翻译和弘传与这两个人有密切关系,而夏拉达字体也正是克什米尔及其临近地区所使用的字体。综合上述信息,初步判断《修学疏》梵本的作者是这个克什米尔家族的成员或徒众,最迟应该不会晚于13世纪。

^① 对于这些梵本的介绍和传抄谱系的最新研究见若原雄昭(2003, 2004)。

^② 关于西藏贝叶经的简要介绍以及罗睺罗、图齐、王森、罗炤的调查编目情况,参见拙著(叶少勇 2011)的附录。

^③ 关于其生平参见加纳和雄(2006)。

在该写本的一叶上（见后附图，叶码存疑）引用了《庄严颂》第 2 品（依烈维本，即该写本以及汉藏译本的第 3 品）的第 9—11 颂，可惜第 4—8 颂在现存残叶中仍未找到。

正面第 6 行：

mahāpuṇyaskandhaṃ tribhuvanagurutvaṃ bhavasukhaṃ
mahādūḥkhaskandhaprasāmaṃ api buddhyuttamasukhaṃ |
mahādharmaśāntaṃ pravaraḍhruvakāyaṃ śubhacayaṃ
nivr̥ttiṃ vāsāyā bhavaśāma vimokṣaṃ ca labhate || (Śikhariṇī)

正面第 8—9 行

śubhodāryād dhīmān abhibhavati sa śrāvakaḡaṇaṃ
mahārthatvānatyāt satatam amitaṃ cākṣayatayā |
śubhaṃ laukyālaukyan tad api paripākaprakaraṇaṃ
vibhutvenāvāptan tad upadhiśame cākṣayam api || (Śikhariṇī)

背面第 1 行

tadbhāvaprārthanāto 'bhyupagamanam idan tanmataṃ ca kṛpātas
sarvākārajñātāto hitasukhakarāṇaṃ duṣkareṣv apy akhedah |
niryāṇe sarvayānailḡ pratiśaraṇaḡaṇenānvitatvaṃ ca nityaṃ
saṃketād dharmatātas śaraṇaḡamanatā dhīmatām uttamāsau || (Sragdharā)

原民族宫藏梵文写本中一共存有 9 叶《修学疏》残叶，散置于第 10 函（1 叶）、第 15 函（7 叶）与第 17 函（1 叶）之中。《王森目录》（王森 1985，后简称《王录》）对第 15 函有这样的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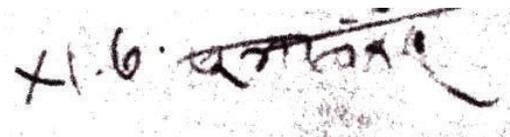
15.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大乘庄严经论（有汉、藏译本）（有梵文校勘本）

1—18 叶（残）

Maitryanātha 弥勒护

事实上，这一函中除了该论的 7 叶之外，还包含 11 叶其他著作的散叶。王森先生的比定，可能是看到该函中的最后一叶（即《修学疏》第 14 叶）空白处有罗睺罗的手迹：



XI. 6. sūtrālaṃkāra

如果核对罗睺罗写本目录的 XI.6 号（Sāṅkṛtyāyana 1935: 31），可以发现这样一条

记述:

Ṣa-lu monastery, XI.6, 44. *Sūtrālamkāra(vi)bhaṅga*, Śāradā, 20 $\frac{2}{3}$ × 2 $\frac{1}{3}$ inches, Incomplete

Footnote: Owner of this book was the Indian paṇḍita Maṇikaśrījñāna, a contemporary of Bu-ston (1290-1364 A.D.)

可知这些写本原藏夏鲁寺。罗睺罗所录的 *Sūtrālamkāra(vi)bhaṅga*，有可能是 *Sūtrālamkāraparicaya* 之误。

加纳和雄博士曾发表过 (Kano 2008) 一组图齐 (Giuseppe Tucci) 摄于西藏的写本照片^①，包含以夏拉达字体书写的 9 片贝叶，其中的一叶就是民族宫梵本第 10 函所藏的那一叶《修学疏》^②。在前述的藏学研讨会期间，笔者得以与加纳和雄博士以及藏学研究中心李学竹博士深入交流，得知罗焯先生的《布达拉宫所藏贝叶经目录》(罗焯 1985, 丹珠尔, 44. (三), 136 页, 后简称《罗目》) 中有一条记述与《修学疏》有关:

《经庄严论》(*Sūtrālamkāra*, 藏文为 mdo sde'i rgyan |) 片断。共 34 叶, 不完整, 残缺较多, 叶码较凌乱, 来不及细加整理, 其中有 *Parijayaparipākādhikārobhavama* 品。贝叶长 53.9 厘米, 宽 5.2 厘米, 每面墨书梵文 7-8 行, 字体介于“悉昙”与“达利迦”体之间。在第 30 叶上写有藏文: bal dpe | 可知这部贝叶经是在尼泊尔写成, 由尼泊尔取回西藏的。

其中的 *Parijayaparipākādhikārobhavama*, 后经核实应作 (*Sūtrālamkāra*)*paricaye paripākādhikāro navamaḥ*^③, 即《修学疏》第 9 品的题记。于是笔者和李学竹博士、加纳和雄博士将所掌握的信息综合, 发现这一批夏拉达字体的贝叶分别藏于三处的写本照片之中, 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所藏摄于布达拉宫的梵本照片, 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与佛教文献研究所收藏的原民族宫藏梵本照片, 以及罗马的意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所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所藏图齐摄于西藏的梵本照片。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加纳和雄已经出版的图齐照片中的 9 片贝叶, 等同于民族宫梵本照片中第 10、16 函。在民族宫梵本的第 10 函以及第 15、16、17 函之中, 共拣出 41 叶以夏拉达体书写且形制相似的贝叶, 而在藏学研究中心藏的布达拉宫梵本照片 (桑德 1987, 第 100 号, 后简称《桑录》) 中则存有 46 叶这样的贝叶。这批散叶有可能最初存放于夏鲁寺之中, 后来 (图齐与罗睺罗于 1930 年代入藏调查之前) 其中的一部分被移至布达拉宫。这 87 片贝叶之中至少包含了 15 部以上的作品, 可惜都不完整, 应该另有一批散叶存于他处, 或已遗失。初步的调查报告将于近期由三人另文联合发表, 以下仅对《修学疏》梵本的调查结果略作介绍。

^① 图齐写本照片目录见 Sferra (2008)。

^② 在加纳和雄文中比定为: An unknown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commentary。

^③ Kano (2012) 曾注意到这一记述, 并在第 36 页指出 *parijaya* 为 *paricaye* 之误。

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所列包含了李学竹博士与加纳和雄博士的研究成果，谨此致谢。

经调查，在藏研中心照片中又新找到了 3 叶《修学疏》，这样该梵本的存世叶数也就增至 12 叶，遗憾的是前述缺失的第 4—8 颂仍然没有找到。叶次内容列表如下：

叶码	包含偈颂		照片出处
	《修学疏》品号	对应 Lévi 本品号	
2(?)	2.8-13	1.8-13	民族宫《王录》第 10 号 = 图齐 MT 42 II/01-7, 02-8
?	3.9-11	2.9-11	民族宫《王录》第 15 号
?	3.11-12	2.11-12	民族宫《王录》第 17 号
5	4.1-13	3.1-13	藏研中心《桑录》第 100 号
7	5.6-11	4.5-11	民族宫《王录》第 15 号
8	5.12-26	4.12-26	民族宫《王录》第 15 号
9	5.26-7.2	4.26-6.2	民族宫《王录》第 15 号
10	7.3-8.4	6.3-7.4	民族宫《王录》第 15 号
11	8.5-10	7.5-10	民族宫《王录》第 15 号
12	9.1-12	8.1-12	藏研中心《桑录》第 100 号
14	9.19-10.10	8.19-9.10	藏研中心《桑录》第 100 号
?	10.78, 82-86	9.78, 82-86	民族宫《王录》第 15 号

《修学疏》现存的这些残叶，保存了《庄严颂》约 100 余偈，是目前学界所能看到的最古老写本之一。初步比对发现，其中引用的颂文与前人刊本有不少差异之处，对于《庄严颂》文本的精校是不可多得的独立文献证据。对这一梵本作进一步研究是今后的一项任务。

参考文献

- 罗韶（1985）：《布达拉宫所藏贝叶经目录》。未出版手稿。
- 桑德（1987）：《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缩微胶卷）目录》。未公开出版。
- 王森（1985）：《民族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作为附录发表于：Haiyan Hu-von Hinüber, “Some Remarks on the Sanskrit Manuscripts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a-Prātimokṣasūtra* found in Tibet.” In: Ute Hüsken, et al (eds.). *Jaina-itihāsa-ratna: Festschrift für Gustav Roth zum 90. Geburtstag*. Marburg: 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 2006: pp. 283-337.
- 叶少勇（2011）：《〈中论颂〉与〈佛护释〉——基于新发现梵文写本的文献学研究》。北京：中西书局。
- 加納和雄（2006）：《サツジャナ著〈究竟論提要〉—著者および梵文写本について—》，《密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9。
- 若原雄昭（2003）：《〈大乘莊嚴經論本頌〉未報告ネパール写本》，《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 51 卷第 2 號。

- 若原雄昭 (2004): 《〈大乘莊嚴經論〉未報告ネパール写本二点について》,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第 52 卷第 2 號。
- Kano, Kazuo (加納和雄, 2005): “Two Folios from Sthiramati’s *Triṃśikābhāṣya* in Sanskrit Photographed by Rāhula Sāṅkrtyāyana: Diplomatic and Critical Editions of Göttingen Xc14/1e.”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 pp. 113-149.
- Kano, Kazuo (加納和雄, 2012): “Eight Folios from a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bhāṣya* from Ngor Monastery: Diplomatic and Critical Editions on X.9-XI.3—Studies of Göttingen Xc14/57 (1).” *China Tibetology*, 18: pp. 33-47.
- Lévi, Sylvain (1907):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ème Yogācāra, vol. I. Paris: Librairie Ancienne Honoré Champion.
- Sāṅkrtyāyana, Rāhula (1935): “Sanskrit Palm-Leaf Mss. in Tibet.” *Journal of the Bihar and Orissa Research Society*, 21-1: pp. 21-43.
- Sferra, Francesco (2008): “Sanskrit texts from Giuseppe Tucci’s collection.” In: Francesco Sferra (ed.), *Manuscripta Buddhica*, Vol. I: Sanskrit Texts from Giuseppe Tucci’s Collection, Part I. Roma: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pp. 15-78.

【电子邮箱: yshaoyong@gmail.com】

Copyright of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is the property of Institute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and its content may not be copied or emailed to multiple sites or posted to a listserv without the copyright holder's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However, users may print, download, or email articles for individual use.